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

中国社会道德发展研究报告

2014

CHINESE SOCIAL MORALITY
DEVELOPMENT RESEARCH REPORT

主 编 葛晨虹
戴茂堂 李家莲
副主编 江 畅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

中国社会道德发展研究报告

2014

CHINESE SOCIAL MORALITY
DEVELOPMENT RESEARCH REPORT

主 编 葛晨虹
副主编 江 畅 戴茂堂 李家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社会道德发展研究报告. 2014/葛晨虹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300-20698-1

I. ①中… II. ①葛… III. ①道德发展-研究报告-中国-2014 IV. ①B8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8157 号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

中国社会道德发展研究报告 2014

主编 葛晨虹

Zhongguo Shehui Daode Fazhan Yanjiu Baogao 2014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印 张 14.25 插页 1

字 数 256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编委会

主 任 陈雨露

副主任 冯惠玲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中	王孝群	毛基业	冯惠玲	刘大椿
杜 鹏	李路路	杨伟国	杨瑞龙	吴晓求
陈雨露	陈 岳	郝立新	贺耀敏	袁 卫
倪 宁	郭庆旺	董克用	韩大元	温铁军

总序

陈雨露

当前中国的各类研究报告层出不穷，种类繁多，写法各异，成百舸争流、各领风骚之势。中国人民大学经过精心组织、整合设计，隆重推出由人大学者协同编撰的“研究报告系列”。这一系列主要是应用对策型研究报告，集中推出的本意在于，直面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开展动态分析和评估预测，建言献策于咨政与学术。

“学术领先、内容原创、关注时事、咨政助企”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的基本定位与功能。研究报告是一种科研成果载体，它承载了人大学者立足创新，致力于建设学术高地和咨询智库的学术责任和社会关怀；研究报告是一种研究模式，它以相关领域指标和统计数据为基础，评估现状，预测未来，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研究报告还是一种学术品牌，它持续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焦点和重大战略问题，以扎实有力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党和政府以及企业的计划、决策，服务于专门领域的研究，并以其专题性、周期性和翔实性赢得读者的识别与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有自己的学术积淀和学术思考。我校素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注重学术研究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曾陆续推出若干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譬如自2002年始，我们组织跨学科课题组研究编写的《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紧密联系和真实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十年不辍，近年又推出《中国法律发展报告》等，与前三种合称为“四大报告”。此外还有一些散在的不同学科的专题研究报告也连续多年，在学界和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研究报告都是观察分析、评估预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其中既有客观数据和事例，又有深度分析和战略预测，兼具实证性、前瞻性和学术性。我们把这些研究报告整合起来，与人民大学出版社资源相结合，再做新的策划、征集、遴选，形成了这个“研究报告系列”，以期放大

规模效应，扩展社会服务功能。这个系列是开放的，未来会依情势有所增减，使其动态成长。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还具有关注学科建设、强化育人功能、推进协同创新等多重意义。作为连续性出版物，研究报告可以成为本学科学者展示、交流学术成果的平台。编写一部好的研究报告，通常需要集结力量，精诚携手，合作者随报告之连续而成为稳定团队，亦可增益学科实力。研究报告立足于丰厚素材，常常动员学生参与，可使他们在系统研究中得到学术训练，增长才干。此外，面向社会实践的研究报告必然要与政府、企业保持密切联系，关注社会的状况与需要，从而带动高校与行业企业、政府、学界以及国外科研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收“协同创新”之效。

为适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系列”在出版纸质版本的同时将开发相应的文献数据库，形成丰富的数字资源，借助知识管理工具实现信息关联和知识挖掘，方便网络查询和跨专题检索，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适用的增值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系列”是我们在整合科研力量，促进成果转化方面的新探索，我们将紧扣时代脉搏，敏锐捕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热点、焦点问题，力争使每一种研究报告和整个系列都成为精品，都适应读者需要，从而铸造高质量的学术品牌、形成核心学术价值，更好地担当学术服务社会的职责。

目录

导 论	1
报告一 我国主流价值文化社会认同差异性调研	16
一、不同年龄人群对主流价值文化的认同状况	16
二、不同地域人群对主流价值文化的认同状况	27
三、不同职业群体对主流价值文化的认同状况	34
四、主流价值文化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40
报告二 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及其信念与信仰现状调查	43
一、公众价值观、信念与信仰的定义	43
二、当前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及其信念与信仰的现状调研	45
三、信仰：国家、社会与个人的精神支柱与价值支撑	53
四、正确看待中国社会当前的信仰状况	55
五、关于当前社会信仰构建的思考	57
报告三 核心价值观视域下我国大众文化现状分析	60
一、我国大众文化的发展现状	61
二、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流行的原因分析	68
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展	72
报告四 我国主流价值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大众认知状况	77
一、大众对我国主流价值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认知差异	77
二、大众对我国主流价值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认知存在差异的原因	80
三、阻碍大众对当代中国主流价值文化的认知认同的外部因素	83
四、中国气派与国际视野：从民族走向世界	84
报告五 基层公务员价值观状况调研与分析	87
一、基层公务员价值观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87
二、基层公务员价值选择困境的原因分析	94

三、基层公务员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对策思考	102
报告六 中国村镇政治文化建设与主流价值文化认同	115
一、当代中国村镇政治文化建设现状	115
二、乡村政治文化建设所存在的问题	117
三、当前乡村主流价值文化缺失的社会影响及应对策略	124
四、当前乡村农民政治文化缺乏的原因的思考	127
报告七 我国农村集体主义价值观现状与建设路径	130
一、当前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现状	130
二、合作经济背景下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新内涵、新维度	133
三、我国农村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建设路径	138
报告八 道德文化与我国主流价值文化的构建	141
一、道德文化是核心价值体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41
二、当前我国道德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143
三、着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	153
报告九 培育核心价值观与弘扬传统文化的相关思考	166
一、社会公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状况	166
二、依恋与疏离：公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纠结心态	168
三、培育核心价值观与弘扬传统文化关系的思考	170
报告十 我国主流价值文化构建中政府引领和民众参与问题研究	175
一、我国主流价值文化构建的政府引领和民众参与中存在的问题	175
二、我国主流价值文化构建的政府引领和民众参与中存在问题的分析	179
三、加强我国主流价值文化构建中政府引领和民众参与的建议	181
报告十一 大众传媒与主流价值文化构建	187
一、大众传媒与主流价值文化的关系	187
二、大众传媒在构建主流价值文化中存在的问题	190
三、大众传媒在构建主流价值文化中的责任和功能	199
报告十二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生态	205
一、文化生态与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	206
二、文化生态中的核心价值体系：理论能量的凝聚	209
三、社会文化生态与多元价值的整合	213
四、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与社会化的机制建设	217
后 记	221

导 论

中国已进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政思路，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主题，也表明国家在治国方略和执政定位方面已进入“依法治国”的语境之中。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法治是基础之维，治国重器，善治前提。法治不在，国将不国，社会将无序，社会公正将无法持守。但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应多向度交集共治展开实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决定》也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德治、文化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维，而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价值共识在德治和文化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对“文化强国”也作了着重强调，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努力构建中国话语权和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力。正因为核心价值观文化如此重要，本年度的《中国社会道德发展研究报告》结合“中国当代主流价值文化研究”以及“公民思想道德与社会文明程度研究”相关课题的调研结果，锁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主流价值文化的大众化和现实构建领域，对社会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主流价值文化的认知、认同状况，存在的问题及主流价值文化的构建思路进行了相关分析。

—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及其文化的培育践行提出了全方位的要求。《意见》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变的新特点，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在核心价值观以及核心价值体系主导下形成的主流社会文化，可被视为核心价值文化或主流价值文化。

文化包含的内容很多，有科学技术、价值理念、理想信念、社会法律、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文学艺术以及相关表意符号等。其中价值模式最为核心，它决定了一个文化系统的性质，为社会制度、规则秩序的合理性提供了最直接的论证。正是这些核心价值文化，凝聚并形成了社会公众的“共意”或共同价值观，在社会秩序维护和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核心价值观及其理论文化具有国家发展道路的指向功能。中国要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就要坚守自己的核心价值原则。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同时我们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不能丢，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本原和文化之根，当然，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有一个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问题；再者，必须信守并维护法律和道德规范所体现的社会基本价值内涵，这是社会法治和德治的基本价值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上述各种维度的价值理念的系统表达。

核心价值观及其文化体系，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社会发展道路的旗帜，“一种特有的思想先导作用，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或社会危机时期，意识形态常常成为社会动员人们向既定的方向和目标前进的一面思想旗帜”^①。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或核心价值观，起到引领文化、理论和发展道路的作用。理论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等同于任由各种价值观杂乱无序地发展。

① [美] 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96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中国社会处在变革发展中，它需要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指导，需要有序而非紊乱的思想文化价值秩序，需要大众对执政价值理念的认知和认同，需要中国特色的共同价值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每一社会都有其独特的社会精神气质，它因社会的经济方式、政治理念、文化传统而形成，反映社会的价值需要、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涵盖社会的理想信念、精神风貌、道德规范，构成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对经济社会建设、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发挥着引领和主导作用。”^①

核心价值观及其理论体系，可以为国家发展道路和制度的选择提供理论支撑。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理论和体系一旦崩溃，或者社会民众不能形成价值共识，指引整合国家社会的思想文化纽带将不复存在，轻则社会发展受到阻滞，重则国家和民族不再兴盛甚至衰亡。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②

所以在当前中国“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中，要关注中国特色的理论构建和文化建设。文化，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文化是有价值属性的，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中探讨了文化属性问题，指出“资本主义文化的确有使世界同质化的倾向，而文化的同步化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现代性的特征’。但资本主义是一个‘经济—文化’二元复合体系，其经济基石是财产制度与商品生产，其文化的要素则是一种无孔不入、商品化了的交换关系”^③。“资本主义文化”中那些全球“同质化”的东西，如环境理念、效益理念、民主平等、诚信道德、艺术文化等，都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财富，中国文化在参与共建也在吸收共享，但汤林森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那些关乎道路选择的东西，我们就不能不加辨析地照单全收。中国价值观文化及理论构建不仅要张扬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和传统价值，还要凸显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主张。诺贝尔奖得主缪尔达尔也曾就“价值中立”主张指出：“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的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④ 社会政策资深学者蒂特姆斯也指出：“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⑤

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使社会经济结构和阶层发生了深刻变迁，全球化背

① 袁贵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1）。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册，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③ [英] 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④ [瑞典] 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13页，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⑤ [英] 蒂特姆斯：《社会制裁十讲》，15页，香港，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

景也使各种理论、文化的交流或碰撞更加活跃,中国社会各界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多种变化,涌现出各种理论和思潮。理论的活跃是文化大发展的表征,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也表现在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上;但包容多元文化和多样价值观,不等于说不要主导的社会理论,不要共同的价值观原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想有序发展、和谐发展,就必须在多样价值观和多元理论文化中找出“最大公约数”,确立符合国情的主导理论体系,即构建起核心理论基础和共同价值观。因为它是社会成员整合凝聚、社会秩序运转的精神根源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指导。

核心价值及共同价值观具有社会整合功能。社会整合是通过多个维度实现的,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的整合,社会功能机制以及社会文化、价值规范的整合等。社会价值的凝聚整合,必须建立在社会上下的“共同价值观”基础之上。诸多社会整合理论都在推崇核心价值及其文化的整合功能,认为社会“共意”的存在,即使社会成员认同、共享这些价值观,是一种重要的国家能力。社会功能学派代表帕森斯认为,社会体系的整合非常依赖于共享价值理念及其文化系统。“文化系统”在帕氏理论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帕氏认为,正是社会成员认同且受其影响的共同价值观,能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凝聚力,将社会成员整合在一起。在他的《社会体系和行动理论的演进》中,我们看到了几个关键词:社会秩序、公民素质、共同价值观。

葛兰西曾将意识形态的凝聚作用比作“水泥”,他说:“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①如果过多的社会成员拒绝社会共同价值观,社会离心离德严重,社会系统就会崩溃。可见“文化系统”是调控社会秩序和保证社会整合凝聚的关键之一。

核心价值观及其文化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了精神家园和文明之“道”。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有中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文明未曾中断。这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已成为一个引起众多学人兴趣并探究其中原委的历史现象。究其根源,最重要的是中华文明不但有文化之“术”,即辉煌的文化形式和器物的积累,还有深厚的文化之“道”的创造和流传。正是东方智慧和民族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文明之“道”。任何一种文化都凝结着一定的价值理念,它就是文化的灵魂,或曰文化其“神”。守护文化其“神”,就要把握凝结在文化之中的精神实质——价值理念,从而把握文化立场、文化取向和文化选择,这是文化自觉的根本要求。^②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就是在创建属于中国的文化之

① 转引自[希]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21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② 参见朱贻庭:《守护文化其“神”》,载《道德与文明》,2011(3)。

“道”和“精神家园”。

涂尔干在研究社会问题时指出,价值失范是引发社会无序、松散,人们迷茫困惑、不安甚至自杀的重要原因。在社会发展变迁的过程中,在传统社会旧有的生活习俗、道德规范和信仰变化瓦解的同时,如果新的价值观没有完全跟进建立,就会产生令人不安和困惑迷茫的社会阶段。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进一步把“社会失范”的含义由“无规范”诠释为“规范冲突”,认为社会价值观的不同组成部分间的冲突,以及文化蕴含的价值目标同社会当下的制度环节之间的游离,是造成社会失范的原因。

核心价值观倡导的道德取向有利于培育心灵秩序和社会公共精神。现代社会治理中,政治精英、学者经常强调制度建设及其功能,这是对的,没有制度法治国将不国。但问题不在于此,问题是许多社会治理理论在强调大力发展外在制度性规范建构的同时,忽略了现代人的内在心灵秩序问题。须知外在制度秩序必须与内在心灵秩序相结合才会形成真正的社会秩序。

转型期人们的心灵往往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市场经济、现代化在带给人们诸多物质满足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心灵秩序的“碎片化”和“无意义感”。伦理思想史上提出三问:什么是好生活?为好生活我们应该怎么做?人应当成为什么?现代人容易关注“应该如何行为”而非“成为怎样的人”及“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功利主义导向的世界,往往使人忘记了人性的高贵、人的美德的意义,丧失了人的精神家园。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片面“物化”的发展模式忽略甚至放逐了精神家园和意义世界高贵人性的追求,社会才会出现大量道德问题。因此,人们也把来自现代物化生活模式、规则功利主义对道德社会规导的局限,称作“现代性的道德困境”。

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市场转型中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人际关系建立在了一种非血缘的、陌生人的、个体化了的利益关系基础上,交往活动不再囿于亲缘范围而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体现为一种现代性的公共交往。中国传统社会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仁爱道德维系着社会的“熟人”关系。而陌生人交往或现代公共生活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友爱德性即公共精神的普遍化,其中就包括对陌生人的友爱和他人意识、责任意识。

在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原有的血缘关系社会基础和精神文化被冲淡后,新的契约法制关系和适应陌生人际的公共精神还未准备好,因此容易出现“道德冷漠”、“信任度低”等社会问题。以道德冷漠为代表的转型期道德困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缺乏“公共精神”或者“公共社会德性”。也就是说,转型

后的现代公共生活中人与他人之间的相处，需要更多的他人意识和“共在”意识。转型期中国面临诸多问题，重要问题之一即如何应对碎片化、个体化、陌生化了的市场经济。存在主义学者穆尼埃在强调人与他人关系的重要性时曾说，“古典哲学常常令人奇怪地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如果你数一下古典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你会看到这些问题：认识、外在世界、自我、灵魂与肉体、心灵、上帝和来世。在古典哲学中，与‘他人的关系’所产生的问题从未获得与其他问题同等的主要地位”^①。在此种问题意识中，我们应能够理解“商谈伦理学”、“主体间性”理论的重要性。核心价值观强调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在解决人与国家社会、人与他人的和谐关系问题。所以，对于一个“好社会”而言，仅有物质不够，仅有制度也不够，要想建立真正公平和谐的社会，在制度正义、依法治国的基础上，还需要核心价值、社会德性、公共精神等作补充。

总之，在多维复合式的国家治理体系中，文化治理是重要一维，而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价值共识在文化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必须切实树立“文化强国”的战略思维，对中国特色价值观及其主流价值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进行重新审视并定位。在一定意义上，核心价值观等主流价值文化，是当今中国发展与治理的一种重要的国家政治资源。换句话说，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思路中，必须有足够的“文化强国”、“文化治理”意识。

二

核心价值文化及社会价值共识可以为中国打造软实力。中国文化及其价值观在国际竞争中应当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是公众的期待，也是现实的问题。在相关调研中，公众大多认为我国当前主流价值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还不够，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理论、价值观及其文化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一样，既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机遇，也面临着国际文化竞争的挑战。国际文化竞争首先表现为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竞争，但作为国际竞争的一部分，文化竞争历来包含着价值观和思想意识的较量。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对此强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习近

^① [法] E. 穆尼埃：《存在主义哲学家》，英文版，72页，1949。

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思路中，也包括了文化安全。

近些年许多人在使用“文化安全”的概念，事实上，对文化安全进行关注首先是从美国开始的。冷战结束后，一批国际政治学者和美国政界人物率先研究新格局下的新问题。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将会占据国际政治问题的中心，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产生冲突的主要是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引起了全世界对文化安全问题的关注，冷战结束后的状况也使西方国家普遍认识到，国家安全问题已由传统的军事领域扩展到了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事实上我们已看到，“软实力”理论在美国近年国际事务和外交路线中，也变成了“巧实力”思路。

可见，思想理论实力或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在国际竞争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①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中曾预言，中国也将像苏联和东欧一样演变为资本主义，他说：“从长远来说，中国将成为那些已经在东欧、苏联和不发达国家把共产政权扫下台的巨大变革的一部分。……由于有了信息革命，各种思想将越过长城上空进入中国，用不着穿过城墙或者在墙根下挖地道——而且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战略防御计划会把它们击落。”

布热津斯基作为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超越军事和经济领域，关注和考虑如何布局“文化”棋子，确因当今世界，文化已成为国家安全问题中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美国“9·11”事件后更成为西方世界的共识。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中提出了“文化统治”概念，在美国全球“大棋局”布局中，美国的文化战略正通过电影、电视、音乐、语言、互联网、教育以及生活方式的影响而全面展开。^②

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但外媒称中国是“经济巨人，道德侏儒”，也有人说中国不是世界大国，因为它没有向世界输出文化价值观。《纽约时报杂志》载文《在意识形态领域推销美国》：“决定美国资本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武装力量。”这种论断不仅适合美国，也适合中国等一切国家。“软实力”理论强调，在社会治理的多维因素中，有些因素是硬性或显在的，如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等正式制度体系；有些因素是软性或潜在的，如社会意识形态、共同价值观、传统文化、道德要求等。就社会治理能力而言，政治制度和法律的硬性治理必不可少，但价值共识、精神信念、社会风气及其道德力量产生的非强制性约束，对社会

①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② 参见〔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35～3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治理、对引导公民自觉接受社会规约，具有更积极的作用。诺奖得主道格拉斯对此强调，即使在最发达的社会体系中，“正式制度”的约束也只能决定人们行为选择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是由“非正式制度”即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规则来约束的。

在这个关注“文明冲突”、“文化统治”及思想影响力的国际竞争时代，在世界多元价值体系和世界意识形态的复杂格局中，中国应怎样关注自身的国家安全问题，在国家安全问题中文化安全具有怎样的地位，中国应走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道路，坚持什么样的理论文化和价值观，对这一切，我们都必须有清醒的自觉意识。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及其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实力。

应当说，中国上下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意见》对此明确强调：“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对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习近平在系列讲话中针对竞争软实力构建提出了话语权问题：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注重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根基，构建中国话语权。目前在国际文化竞争中，中国在话语权上并不占优势。美国等国家认为：“在宣传上花 1 美元，其效能等于在国防上花 5 美元。”^① 尼克松在《不战而胜》中说：“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艾伦·杜勒斯曾说，“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美国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都能够教会他们按照美国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②。政治学者伍德曼在研究美国在拉美国家的文化战略后说：“文化帝国主义控制和西化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心理，使他们与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保持一致。文化帝国主义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作用，原因在于它从内部控制了人民，装扮成了他们的自由意志。文化帝国主义的作用是控制第三世界人民的精神，形成政治上顺从的民众，在人民中间唤起消费主义的愿望，从而为西方的商品培育丰富的市场。文化

① 见 <http://lib.hnswdx.gov.cn/164/list.asp?id=290>。

② 转引自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226 页，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

帝国主义的目标强烈地针对年轻人，因为他是理想的观众，社会敏感度高，易于适应变革。”^①

“文化帝国主义”是否存在？在《哈珀现代思想辞典》（1977）中，“文化帝国主义”被界定为“运用政治和经济力量，在牺牲当地文化的同时宣扬并传播外来文化的价值和习俗”。1982年，法国文化部长雅克·朗把“文化帝国主义”界定为“不再夺取领土……但却改变意识、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帝国主义”^②。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在研究美国传教历史时也用了“文化帝国主义”概念，并指出传教士在传播中没有使用经济或政治方面的权利，但是他们的传教行为反映出美国文化对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的有目的的侵入^③。“谁在说”等话语权问题也引起世界组织的注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早在1992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就已把文化安全列为人类社会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力^④。

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价值观，有中国历史积累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有自己坚信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念及其理论。中国文化建设必须有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不能简单用西方的价值文化来代替。美国著名政治文化学者赛义德说：“文化是一个舞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⑤在国际多元价值文化竞争的背景下，我们更应强化对中国特色价值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注重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及其文化软实力。

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文化如何大众化，如何取得公众的认同，如何形成社会合力，形成社会共同价值观，也是一个需要重点调研和研究的问题。

核心价值文化和主流价值文化建设要从理论构建开始。理论是社会发展的思想灵魂，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和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社

① Peter Woodman, “Cultural Imperialism in Columbia,” <http://www.colombiasolidarity.org.uk/Solidarity%208/culturalimperialism.html>.

② Gienow-Hecht, “Shame on US? Academics, Cultural Transfer, and the Cold War-A Critical Review,”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4, No. 3, Summer 2000, p. 472; Robert Arnoe (ed.), *Philanthropy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6, p. 156.

③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and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363-364.

④ 转引自周建标：《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载《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⑤ [美]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 1994, pxiii. 参见韩少波等译《赛义德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